

热点聚焦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,特别是在贫困地区——

精准扶贫如何更见效

本报记者 张双 林火灿 乔金亮 陈发明 代玲 刘兴



左图 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安康市委书记郭青(中)建议:“对绝对贫困人口,国家要加大保障力度,扶贫不要留死角。”

下图 人大内蒙古团张学勤代表(左)与同团的胡毅峰代表交流扶贫问题,他们认为,推进少数民族扶贫政策关键在“实”,要精准到户。

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

“小康不小康,关键看老乡。”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,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,特别是在贫困地区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持续打好扶贫攻坚战,深入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,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。难度再大,今年也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。

准确识别因户施策

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。去年是国家精准扶贫的启动之年,从全国层面看,通过建立精准扶贫机制,制定贫困识别建档立卡工作方案,共识别贫困村12.8万个、贫困人口8862万人。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,西藏采取“靶向疗法”精准划定扶贫对象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西藏山南地委副书记、行署常务副专员云丹介绍说,“山南地区把建档立卡作为精准扶贫、精准管理的重要抓手,要求识别扶贫对象的全过程都要有群众参与,做到民主评议和集中决策相结合,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合理确定扶贫对象,确保真正的扶贫对象进入帮扶范围。”

书记、镇长明经华告诉记者,“我们会根据贫困户的不同情况,因户施策,有针对性地进行扶贫。比如,对于孤寡老人或因病致贫失去劳动能力的,就帮助其申请低保;对于家里有劳动力、因就业信息不畅通致贫的,就为其提供就业信息,并组织接受专业技能培训;对于因教育致贫的,就通过镇里成立的教育基金会,对贫困学子进行帮扶。”

产业扶贫是核心

“近年来,国家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投入很大,但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产业发展问题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定西市委书记张令平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议,报告中“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”后面,应该加上一句“加大产业扶贫开发力度”。“扶贫的核心问题是产业扶贫,产业发展不上去,扶贫成果

也不会巩固。”张令平代表说。

“给钱给粮,都不如引来脱贫致富带头人实在!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平坝县高峰镇麻郎村党支部书记刘乔英感慨地说,“通过龙头企业带动,实现农民多种渠道增收,更有利于激发大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。”麻郎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。2014年,贵州省在建设贵安新区的过程中,将麻郎村划入了贵安新区。几家专业化农业公司的引入,为麻郎村带来了脱贫致富的良机。刘乔英代表介绍说,“农业公司进驻后,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公司,每亩地每年可以获得700元流转金,土地租金每3年递增50元。农民还可以到公司上班,每天获得70元劳务收入。一些青壮年劳动力参与到新区建设中,有的搞起了运输,有的到附近工厂上班,每个月还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。”

“农村发展离不开土地,精准扶贫一定要做好土地文章。通过移民式扶贫和产

业扶贫对接,一方面把分散在高山上的村民搬迁集中居住,另一方面利用好土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,使他们移得出、稳得住,这是我们村脱贫的秘诀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英山县百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初说。

关键在于转变观念

“很多贫困地区穷就穷在观念上,扶贫的关键是改变贫困地区的发展观念,这样才能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‘四两拨千斤’的作用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王岗村党支部书记花全说,“扶贫资金不是救济款,不能搞平均主义,扶贫方式也要从‘大水漫灌’转向‘喷灌滴灌’,精准扶贫要让扶贫对象真正有收获,增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和自觉性。”

花全代表认为,“中西部地区扶贫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量劳动力外流,留在村里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。这些留守的人文化程度有限,也缺乏致富思路,只能等着政府‘输血’。要真正带动老百姓造血式脱贫,关键要让有能力、有意愿脱贫致富的人先发展起来,再把其他农户带动起来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殷美根表示,“扶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,不仅要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,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、自身发展的问题,还要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,让困难群众破除诸多壁垒,更多地享受改革成果。要开拓思路,用改革的办法统筹住房、就业、户籍、教育、医疗、保障和发展等问题,解决边远困难群众长远生计。”

对于深入实施精准扶贫,多位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力度。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江泽林指出,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集中连片扶贫意义非常重大,要积极推进。”明经华代表说,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脱贫的前提,有些地方路都不通,农产品卖不出去,难以实现脱贫致富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也应适当提高一些,才能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。”

三月随想

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,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,“自由落体”不行,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。这个“醒”提得非常重要,也非常及时。

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一件大事,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之举。过去的一年,中央继续紧锣密鼓地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,实行“先照后证”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商事制度,启动铁路运输、邮政业、电信业“营改增”改革试点,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等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,点燃了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激情,激发了市场活力。自去年3月实施商事制度改革,到年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146.7万户,增长16.8%,注册资本增长85.8%;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8.1%,增速比固定资产投资快2.4个百分点。尤其是铁路、教育、医疗等传统行业的行政壁垒被打破后,民间资本大量涌入,为这些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。

然而,一些来自企业和基层的代表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反映,简政放权改革在实践中也出现了“自由落体”现象,突出表现为一些地方的政府把权力放下去了,但该管的事没人管了,变成了“甩手掌柜”,群众办事还是有困难。还有一些部门和地方以放权的名义“放责任”,将那些管理难度大的事项一股脑儿地下放,却不考虑基层单位是否具备管理能力,造成基层“小马拉大车”现象,影响了工作效率。

“放”和“管”是车之两轮,只有同时转起来,车才跑得快、跑得稳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,要“加大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改革力度”。当前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对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因而更不能将简政放权等同于“一放了事”,反而需要通过放活,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,用政府权力的“减法”换取市场活力的“乘法”。评判简政放权改革效果如何,不仅要看各地取消和下放了多少审批事项,更要看这些事项是否被有效承接,相关举措是否释放了经济潜力、是否激发了经济活力。“自由落体”肯定不行,能最终被百姓“获得”才是硬道理。

声音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建三局董事长陈华元:

建好“共同沟”告别“拉链路”

只有将市政、电力、通讯、燃气、给排水等各种管线集于一体,加快修建“共同沟”,才能从源头上杜绝“拉链路”现象。这需要制定完善的地下管线管理规章制度,对“共同沟”的所有权、规划权、建设权、管理权等做出具体的规定,使地下管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。同时,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,并建立让民间资本愿意进入的利益保障机制。(本报记者 亢舒整理)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华谊集团副总裁王霞:

用制度改革留住人才

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,我国传统产业必须进行创新升级。在这一过程中,要解决因人才外流导致的一系列问题。堵不如疏,体制改革是关键。要改革创新成果的分配机制,用激励机制留住人才,聚拢人心,既要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,也要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。同时,还应该把知识产权恶意侵权案件纳入信用记录,以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。(本报记者 余惠敏整理)

全国人大代表、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日红:

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发展

我国休闲农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,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例如,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充分,企业出现融资难、融资贵等困难等。因此,需要对休闲农业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,探索建设农民土地流转示范区,适当扩大农业设施用地规模,并进一步加大对休闲农业项目发展的融资力度。(本报记者 倪伟岭整理)



把脉国产医疗器械发展难题——

合力破解医疗器械“成长的烦恼”



提高医疗器械质量,需要企业、使用者和监管方互相促进,共同完成

通过医保政策调节和媒体宣传等方式,强化医务人员、患者和家属使用国产医疗器械的意识



本报记者 吴佳佳

有益探索,该院规定医生的创新成果归自己所有,所产生的效益80%归医生个人。”“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仍以进口产品为主,即使是质量上等、价格合理的国产医疗器械,进入医院的比例仍较低。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种植牙为例,基本以进口为主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原院长俞光岩表示,这里有多重原因,比如有的厂家或销售部门售后服务较差,患者和家属更多要求使用进口医疗器械等等。俞光岩委员建议,我国应该出台政策,促进国产医疗器械产业发展,如设立国产医疗器械研发的科研基金,大力支持相关企业的产品研发,加强与医学研究人员的科研合作等。同时,也应通过医保政策调节和媒体宣传等方式,强化医务人员、患者和家属使用国产医疗器械的意识。同时,虽然国产设备的质量较过去有了大幅提升,但是目前还缺乏整体性的质

量评价报告。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资源处处长焦亚辉提出,目前医疗器械领域还缺乏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质量评价报告,这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至关重要。全国政协常委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焦红提出,国家食药监总局正在大力推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。“医疗器械售后服务、质量持续跟踪等,都是企业质量体系涵盖的内容。”提高医疗器械质量,需要企业、使用者和监管方互相促进,共同完成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池慧介绍,目前我国医疗器械监管人才队伍严重不足,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,加强各级医疗器械监管部门人才队伍和能力建设,增加编制,扩充医疗器械行政监管人员队伍,以强化国产医疗器械的质量监控。

近年来,国产医疗器械创新水平有所提升,但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,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仍以进口产品为主。究竟是什么在制约国产医疗器械“上位”?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业界人士,为国产医疗器械创新发展“把脉”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霍勇介绍,“我国医疗器械尚未掌握整体上原创的产品。比如,虽然自2013年起国产支架就已占据

3/4的市场份额,但原创性产品并不在我们手中,只是进行了一些局部或细节性的改进。”霍勇委员说。医疗器械生产,企业可能会有好的创意,但他们对器械的临床需求和应用中的不足,不如医生了解得清楚。提高国产医疗器械创新水平需众人划桨,不能让医生成为看客。霍勇委员说,应该出台扶持政策,投入科研资金,鼓励临床医生参与医疗器械研发。“目前,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进行了

本版编辑 王薇薇 马洪超 孟飞 李瞳 美 编 吴迪